



大会

Distr.: General
21 July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26(a)

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的 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在根据大会第 [74/122](#) 号决议提交的本报告中，秘书长强调需要加强社会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注重大幅增加和(或)更有效地利用分配给社会发展的资源，以实现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确定的目标。秘书长还检视了冠状病毒病(COVID-19)危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特别指出保持社会支出水平的重要性，以更有力地支持各国为更好地实现恢复制定的政策和战略，使会员国能够重新回到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轨道。秘书长还介绍了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成果，最后提出了供大会审议的政策建议。

* [A/75/150](#)。



一. 导言

1.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标志着向更具包容性和更公平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范式转变，这一转变把人放在发展的中心。会员国在首脑会议上承诺，除其他外创造有利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促进民众实现社会发展；消除贫困；促进充分和生产性就业；促进社会融合和包容；实现普及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减少不平等；通过联合国系统加强社会发展合作。

2. 在 2020 年 2 月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召开的主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二十五周年：应对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正在出现的社会挑战”的部长级论坛上，会员国确认，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愿景、原则和承诺仍然有效，而且对于应对不平等扩大、人口动态变化、气候变化的影响、快速技术变革等新的全球挑战至关重要。会员国还欢迎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在全面执行《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对进展缓慢和不均衡以及仍然存在的差距深表关切。冠状病毒病(COVID-19)危机加剧了社会发展方面的现有挑战，并对各国政府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二. COVID-19 危机对落实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影响

A. COVID-19 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

3. COVID-19 疫情造成了联合国 75 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卫生危机，带来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报告称，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有 910 多万个 COVID-19 确诊病例，473 061 人死亡。¹ 病毒的快速传播继续给各国的卫生保健系统带来压力，而其中许多国家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处于压力之下。除了直接归因于病毒的死亡外，COVID-19 还可能对健康产生重大的间接影响，就像 2014 年至 2016 年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疾病一样，在此期间，许多死亡是用于治疗其他疾病的资源被分流所致。根据一项研究，在今后六个月里，COVID-19 可能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每天导致额外 6 000 名儿童死于可预防病因。²

4. 全球健康危机已演变成一场多方面的社会、经济和金融危机，打乱了数十亿人的生活，破坏了全球经济稳定。除了对医疗卫生产生的影响，为遏制病毒传播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对社会发展和福祉产生长期影响。例如，学校关闭正在危及儿

¹ 世卫组织，世卫组织冠状病毒病(COVID-19 疫情)看板。可查阅：<https://covid19.who.int>(2020 年 6 月 24 日访问)。

² Timothy Robertson and others, “Early estimates of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aternal and child mortality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modelling study”, *Lancet Global Health*, vol. 8, No. 7 (2020 年 5 月)。

童教育。小学教育的年化实际失学率(为了反映无法上网儿童作出调整)预计将达到 20%，与 1985 年的水平相同。³ 截至 2020 年 3 月中旬，120 个国家的 3.2 亿多名小学适龄儿童无法在学校就餐，这使他们面临营养不良的风险，并对家庭收入造成负面影响。⁴

5. 像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发生的情况一样，教育的持续中断可能会增加辍学率，导致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扩大并加剧性虐待、早孕、早婚和强迫婚姻的风险。⁵

6. 由于为遏制病毒传播而出台封闭措施，导致经济活动停滞，贸易中断，石油和商品价格下跌。从全球来看，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大幅萎缩 5.2%，这将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萎缩，而且远比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糟糕。⁶

7.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这场危机将在 2020 年把另外 3 430 万人推向极端贫困，其中非洲国家将占新增人数的 56%。在最坏的情况下，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可能到 2030 年增加 1.6 亿以上。⁷ 汇款是全球各地 8 亿人的生命线，对减贫具有巨大影响，但汇款在 2020 年预计将下降 20%。⁸ 在全球和国内粮食供应链中断日益严重和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到 2020 年底，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可能几乎翻一番，达到 2.65 亿人。⁹

8. COVID-19 疫情导致的经济萎缩造成重大的就业和收入损失，威胁到数以百万计人的生计和福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数据，危机造成相当于 3.05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流失。失业率迅速上升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5(涉及到 2030 年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和人人都有体面工作)的主要障碍。低收入、低技能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往往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有限，在生病或封闭停工的情况下也没有替代收入。根据劳工组织的数据，非正规经济部门的 16 亿工人(占全世界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人人数的 76%)因封闭措施受到严重影响和(或)在受打击最严重的部门工作。这场危机还对劳动力市场的特定群体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包括年轻人，其中六分之一的人自

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20 年人类发展展望》，“COVID-19 与人类发展：评估危机，展望复苏”，2020 年。

⁴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加紧向因 COVID-19 疫情学校停课而无处就餐的儿童提供援助”，2020 年 3 月 20 日。

⁵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各地的学校因 COVID-19 疫情关闭将对女孩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2020 年 3 月 31 日；救助儿童会和其他组织，“儿童从埃博拉疫情恢复的评估：塞拉利昂”；爱尔兰援助会和开发署，“评估塞拉利昂埃博拉危机期间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2015 年 10 月 26 日。

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通过 COVID-19 疫情的应对和恢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78 号政策简报，2020 年 6 月。

⁷ E/2020/58，第 41 段。

⁸ 相比之下，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2019 年汇款下降 5%。

⁹ 粮食署，“如不迅速采取行动，COVID-19 将使面临粮食危机的人数增加一倍”，2020 年 4 月 21 日。

COVID-19 疫情暴发以来停止工作。在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女性和移民工人的比例也过高。¹⁰

9. 这场大流行病影响社会成果和福祉的方式对每个人的冲击并不平等，这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已经处于不利地位和脆弱的人口将面临远远更加糟糕的处境。许多妇女面临着更严重的经济不安全感和更大的家庭暴力风险，而加在她们身上的无偿照护工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对于许多老年人和残疾人来说，保持社交距离和隔离使其更难获得赖以维持健康和独立的关键服务。土著人民往往更难获得医疗保健，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明显较高，而且无法获得适当的公共卫生设施，因此，他们尤其容易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

10. 贫困、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的加剧也有可能破坏社会凝聚力，并对于包括多边组织在内各种机构已在下降的公信力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实施的居家隔离命令有助于遏制内部骚乱，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4 月 11 日期间，示威活动数量下降 90%。¹¹ 然而，由于经济困难日益严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种根深蒂固的不公正现象，以及危机发生后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抗议和内部骚乱在世界各地再度抬头。

B. 重建得更好：建设更包容、更可持续和更具适应力的社会的契机

11. 各国政府和发展伙伴制定了应对 COVID-19 疫情的措施，包括将健康覆盖范围、失业救济金、带薪病假和带薪家庭假紧急扩大到以前未覆盖的人群，在治疗和疫苗的科学方面开展国际合作，推出总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约 11% 的重大财政刺激方案。这场危机暴露了差距，加剧了挑战，但也让我们有机会制定危机应对政策和措施，在重建过程中构建更好、更有适应力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未来。

12. 由于对薄弱的社会保障系统风险有了新的认识，这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6 月 12 日期间，计划采取或实际采取社会保障措施应对 COVID-19 疫情的国家或领土增加四倍，达到 195 个，而推出的措施增加近十倍，达到 1 024 个。非缴款性社会援助占全球的 60%。现金转账和实物援助都稳步增加，现金转账方案在所采取措施中占多数。¹² 在恢复阶段，许多国家需要对国家全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投资，包括制度设计和交付机制，使弱势社会群体能够受益，以促进包容和可持续恢复，加强对未来冲击的防范。

13. COVID-19 危机或可加速向更可持续经济形式的转型。随着各经济体陷入停滞，许多国家的空气污染大幅下降，这让人们认识到构建可持续经济的可能性，让空气和水更清洁，野生生物更丰富。政策制定者现在正将注意力转向恢复阶段

¹⁰ 见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监测：冠状病毒疫情与工作世界——估计和分析更新”，2020 年 4 月 29 日第 3 版和 2020 年 5 月 27 日第 4 版。

¹¹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20 年全球和平指数：衡量复杂世界中的和平》（悉尼，2020 年 6 月）。

¹² Ugo Gentilini and others, *Social Protection and Jobs Responses to COVID-19: A Real-Time Review of Country Measures* (2020 年 6 月 12 日)。

以及恢复阶段给在包括交通、农业和能源部门在内所有经济领域加速向可持续道路过渡带来的潜力。¹³ 这场大流行病还突出显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侵犯与人畜共患并可能导致大流行病的疾病暴发风险增加两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COVID-19 危机给人类和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突出表明，有必要努力实现绿色恢复，以防止今后暴发大流行病。

14. 这种危险的病毒是没有国界的，这一事实突显了集体行动和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公共卫生系统，确保更好地防范未来的大流行病，全球卫生对策将继续汇集科学人才和资源，以协作开展疫苗研究，并继续强调在医疗卫生是全球公共产品这一理念指导下，与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此外，各国本着全球团结互助精神作出共同努力，防止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并为此承诺不会通过贸易限制和出口禁令，中断国际粮食流动。

三. 从执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更好地重建，以创建一个更包容、更可持续和更具复原力的社会

15. 在举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时，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创造了许多机遇，然而，变革和调整进程发展迅速，也加剧了那些落在后面的人所面临的贫困、失业和社会排斥。环境风险等对人类福祉的威胁也正在走向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变革正在深刻改变所有国家的社会发展的范畴。为了更好地驾驭这些进程，会员国承诺促进社会发展和增进所有人的福祉，并将这些目标定为“当下和二十一世纪的最高优先事项”。¹⁴

16.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世界仍在应对同样的挑战，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面对当前的全球卫生、经济和社会危机，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取得的进展预计会发生逆转，导致更多人掉队。在执行首脑会议成果方面吸取的经验教训可有助于各国更好地重建，并回到为所有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A. 通过包容、创造就业型增长，减少贫困和不平等

17. 在为所有人实现发展方面，由于过度依赖市场能力，在许多国家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契约受到侵蚀。近年来，不平等加剧的影响已经开始放慢减贫步伐，甚至在一些国家使这一趋势发生逆转。COVID-19 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和脆弱性。因此，数以千万计的人可能陷入贫困，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预计将加剧。

¹³ 《绿色和健康运输中的工作岗位：实现绿色转变》(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20.II.E.18)；开放民主，“COVID-19 与农业：即将到来的饥饿大流行这一矛盾体”，2020 年 5 月 11 日；国际能源署，“将清洁能源置于抗击冠状病毒危机的刺激计划的核心”，2020 年 3 月 14 日。

¹⁴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6.IV.8)。

18. 有证据支持这一结论，即包容、创造就业型增长对于同时减少贫困和不平等至关重要。由于这种基础广泛的增长需要生产部门拥有健康、受过教育和技能熟练的劳动力，因此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至关重要。

19. 经验表明，不平等不断加剧这一问题并非不可避免，合理的政策组合可以减少不平等。¹⁵ 解决不平等问题没有一刀切的做法，但各国已经实施侧重于两个优先领域的战略：通过确保平等获得社会服务(教育、卫生、安全饮用水和公共卫生设施及社会保障)来投资于人的能力，利用财政政策更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带来的好处。促进获得土地、储蓄、信贷、住房等生产性资产的政策和措施，对于助力民众抵御冲击和扩大选项也至关重要。此外，必须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以消除基于性别、年龄、地点和其他因素的现有差距，促进弱势群体、社区和个人的社会融入。

20. 各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管理税收和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包括转账支付和补贴，因此，财政政策可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和促进包容增长。财政政策还可以促进社会包容，具体方式包括提高民众的能力，促进教育、卫生和就业方面的机会平等，以及改善获得高质量基本基础设施的机会。各国需要仔细检视其税收和支出政策，以衡量二者在分配方面产生的影响。各国应确保用于社会支出的政府总开支在规模和构成上有利于穷人、面向平等、行之有效。

B. 普遍获得医疗保健、优质教育和技术

21. 基于收入、性别、城市或农村居住地、地理位置和其他社会决定因素，在获得医疗保健、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和金融服务方面仍然存在重大差距。由于这些之前已存在的不平等，COVID-19 疫情在危机期间和从危机中恢复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影响。¹⁶

22. 这场大流行病突出显示，必须改善获得基本医疗保健、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机会，并同时确保没有人因为自付医疗费用而陷入贫困。需要更有效地提供资金，加强国家卫生系统，以改善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并建设应对 COVID-19 等医疗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¹⁷ 应继续承诺加快努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包括提供金融风险保护；人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可负担的基本药品和疫苗。

23. 近年来，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扩大普及，更多的人、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民众以及弱势人群能够获得包括教育和学习机会在内的各种服务。这种可及性有助于打破跨代贫困，同时促进参与，让人们能够作出知情选择。然而，COVID-19 疫情暴露了现有的数字鸿沟，一些学生、家庭和工人无法利用数字技术和在线平台，因此，他们面临的社会排斥恶化，疫情对他们福祉的影响也更为严重。如不

¹⁵ 《2013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不平等现象事关重大》(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3.IV.2)。

¹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COVID-19 灾难的应对可以扭转不平等的局面”，第 65 号政策简报，2020 年 5 月。

¹⁷ 世卫组织，“COVID-19 疫情战略更新”，2020 年 4 月 14 日。

采取紧急行动弥合差距，缺乏互联互通就有可能使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利处境趋于固化。¹⁸ 应努力实现普及联通，并同时确保人人能够获得可负担的数字技术和发展数字技能。此外，越来越有必要扩大移动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方案等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及性。

C. 社会保障

24. 社会保障保护人们免受冲击，提高他们管理和克服影响他们福祉的情况的能力，并减少脆弱性。从长远来看，社会保障可以帮助个人和家庭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善生计前景。有证据表明，全球金融危机的社会后果在社会保障制度最薄弱的国家中最为严重。

25. 在 COVID-19 危机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承诺建立社会保障最低标准，以提供一套国家规定的基本社会保障，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¹⁹ 在建立这些最低标准之后，将进一步努力缩小覆盖差距，使福利更加充分，将社会保障的最低标准扩大到弱势群体，并将不完整的现有社会保障方案精简为适合国情的社会保障系统。此外，各国一直在采取创新办法来保护那些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包括引入补贴支柱以及包含风险评估和可以及时应对冲击的社会保障系统。COVID-19 危机证明，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抵御社会-经济方面的冲击至关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经济稳定器。

D. 创造体面工作和生产性工作

26. 体面工作如果可以提供充足报酬、收入保障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是一个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体面工作不仅对于维持生计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建立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以及给予人们发言权和尊严也至关重要。尽管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居于中心地位，但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无法与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相匹配，这导致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后的复苏没有创造就业机会。就算就业确实实现增长，也不一定带来可靠的收入保障，因为许多工人在不受保护的非正规部门工作，而且往往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此外，收入再分配有利于资本一方，在大多数国家，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有所扩大。

27. 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趋势导致弱势工作岗位(即没有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有限的临时和不稳定就业)的增加。年轻人、妇女、移民和其他弱势人群在弱势工作群体中的比例过高，往往是经济衰退期间最先失去工作的群体。由于 COVID-19 疫情严重扰乱了教育，没有就业、没有接受教育或没有接受培训的年轻人数量可能会增加。由于在劳动力市场的早期经历通常是未来收入潜力的有力指标，目前的危机很可能会对年轻人的福祉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¹⁸ 见 [A/74/821](#)。

¹⁹ 劳工组织，《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7-2019)：全民社会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17 年)。

28. 在 2008 年全球危机期间，许多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的措施来解决高失业率问题，如失业救济金，但也采取了以下措施：加强包容的劳工政策和制度来提供充分的劳工保护，特别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充分的劳工保护；缩小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距；为留住工人采取临时措施，包括例如通过减少工作时间和(或)降低工资；创造更多的体面工作机会开展劳动密集型公共就业保障方案。针对年轻人的措施包括：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支持创业、教育投资和技能发展，提高年轻人的就业能力；努力解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

29. 促进更好恢复的政策措施，包括经济、社会、劳动力市场和创业政策，应考虑到从事非正规或弱势工作的人的具体需要，同时通过创造以人为本的经济恢复，为所有人提供体面工作，防止负面就业螺旋式上升。²⁰

E. 包容性机构和赋权民众

30. 应努力加强现有机构，分享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探索新办法和创新办法，包括让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使之有能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应优先保护、支持和建设高危群体、工人、社区以及中小微企业(包括妇女领导的企业)的复原力。

31. 歧视仍然是被排斥群体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要障碍。若要消除阻碍弱势个人和群体有效参与的障碍，就必须改革机构，改变那些有历史和文化根源的规范和行为。此外，所有政策和措施都必须没有歧视性，并明确处理造成权力不对称和导致歧视的规范和行为，包括通过法律和司法制度。

四. 保持和增加社会支出，更有效地使用分配给社会发展的预算

32. COVID-19 疫情及其经济影响目前正在对公共资产负债表以及对政府抗击病毒传播和支持本国经济的财政能力产生破坏性影响。应利用国内资源调动、官方发展援助和创新型调动资源机制，齐心协力为各国创造必要的财政空间，以保障在社会成果方面取得进展，在恢复过程中重建得更好。

A. 调集国内资源以保存和增加社会支出

33. 正如《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所指出的那样，国内资源调动主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随着这场大流行使世界陷入全球性衰退，各国预算承受压力。虽然所有国家都受到影响，但那些严重依赖汇款、旅游业、石油、商品出口和制造业出口的国家的公共收入正在急剧下降。²¹ 由于迫切需要增加支出，以遏制和减轻危机的影响，这加剧了通过调动国内资源筹集资金的压力。在早期响应阶段，多国政府为了保护就业和生计以及支持经济，制定了应急

²⁰ 联合国，“政策简报：职场与 COVID-19”，2020 年 6 月。

²¹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冠状病毒大流行使小岛屿发展中经济体陷入困境”，第 64 号政策简报，2020 年 5 月；“疫情传播使商品出口国面临越来越多的经济挑战：迫切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应对经济和卫生双重危机”，第 60 号政策简报，2020 年 4 月；“COVID-19 疫情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造成巨大打击”，第 71 号政策简报，2020 年 5 月。

措施，截至 2020 年 5 月，应急措施总额达 9 万亿美元。²² 尽管这些措施可以解决短期需求，但是，其中大多数措施一旦停止，将使受益者易于受到未来冲击的影响。维持对社会保障政策和方案以及对包容性和高质量的教育和卫生服务的财政投资，对于确保可持续地从 COVID-19 疫情恢复和创造更具抵御未来冲击能力的社会至关重要。

34. 在许多国家，国内公共资源调动方面的进展不足以匹配《2030 年议程》的规模和雄心。2015 年至 2018 年，只有约 40% 的发展中国家明确提高了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²³ 税收收入趋势在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内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2012 至 2017 年，亚洲和非洲的税收收入下降，这两个地区的税收中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低。相比之下，欧洲、大洋洲和美洲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收入下降后，同期税收收入有所回升。²⁴

35.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放缓，因此，必要的国内收入增长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国家税收政策和管理的政治意愿。在全球各地，避税和逃税仍然是调动国内资源的主要障碍，这导致对社会发展投资的巨大损失。例如，在拉丁美洲，2017 年与不遵守税收规定相关的成本达 3 350 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3%。²⁵ 能否多管齐下打击避税和逃税，取决于宣传自愿守法、实施税收政策变化(例如修改税法以堵塞漏洞)和加强执法措施。²⁶

36. 税收正规化方面的努力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如果同时重新分配公共资金为社会发展提供资金，就会对平等产生重要的非财政影响。例如，许多国家已经试点将化石燃料税前补贴重新分配给社会保障系统。²⁷ 同样，增加对有害环境消费品(如取暖和烹饪燃料)的税收，同时确保贫困家庭不会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或增加烟草等危害健康产品的税收，都是可持续的国内增加税收战略。官方发展援助可通过加强税收政策的设计、管理和执行，在支持国家税收调动战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18 年，为此支付的官方发展援助同比增长 23%，达到 2.61 亿美元，相当于官方发展援助的 0.22%。²⁸

37. 优先考虑行之有效的累进税收制度和支出，对于防止 COVID-19 疫情后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确保更公平的社会结果至关重要。财政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因国家而异。在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平均抵消了约三分之一的市场(税前和转账前)

²² Bryn Battersby, W. Raphael Lam 和 Elif Ture, “Tracking the \$9 trillion global fiscal support to fight COVID-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博客, 2020 年 5 月 20 日;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COVID-19 疫情: 通过财政刺激计划解决社会危机”, 第 58 号政策简报, 2020 年 4 月。

²³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20.I.4)。

²⁴ 同上。

²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019 年财政全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的资源调动税收政策》(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19.II.G.11)。

²⁶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19.I.7)。

²⁷ 《发展筹资: 进展与展望》(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17.I.5)。

²⁸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收入不平等，其中 75% 的抵消来自转账。²⁹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实物转账也会影响市场收入不平等。然而，自 1980 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的税收累进性在持续下降。³⁰ 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再分配要有限得多，因为这些国家更多地依赖间接税，而间接税通常作为销售税和增值税征收，这些税往往更具累退性。发展中国家的累进税率也较低或效率较低，难以建立普遍社会方案。直接所得税和各种类型的财产税可能是最具有累进性的税收形式，但这取决于它们的设计和管理方式。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普遍不正规，因此此类收入较低。

38. 在社会支出方面，许多地区对社会保障基本制度的经费滞后。一个全面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助于缓解混乱，缓冲 COVID-19 疫情的负面影响。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平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7%。这远低于经合组织约 20% 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11.3% 的三分之一。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估计，如果该区域设立社会保障最低标准以保证整个生命周期的最低收入，就必须每年再投资 3 170 亿美元，这相当于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 1%。³¹

39. 提供全民优质教育需要大量额外资金。在低收入国家，对目标 4 前两个具体目标(与普及学前和中小学教育有关)的年度总支出需要增加三倍以上。³² 国内公共财政是实现关于全民优质教育的目标 4 的最重要资金来源，占全球教育支出的 79%。低收入国家将教育作为其公共支出的更高优先事项，但按学生人数计算依然很低，每年对每个小学生的支出不到 200 美元，而高收入国家约为 8 000 美元。³³ 因此，家庭不得不直接为教育费用提供更大份额的资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家庭支付了所有教育支出的一半以上，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不到 15%。对家庭的过度依赖引发了对平等问题的担忧。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正在改革税收制度，以改善教育资金投入。

40. 医疗卫生支出持续增长。2000 年至 2016 年，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每年都在增长，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4%，高于全球经济 2.8% 的年增长率，达到 7.5 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10%)。尽管支出增加，但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到 2030 年，预计将有 39% 至 63% 的世界人口得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覆盖。因此，需要显著加快速度，才能到 2030 年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具体目标 3.8。³⁴

41. 不到 1% 的全球医疗支出来自外部援助，这使得国内医疗支出成为全民健康覆盖的核心。虽然外部援助在中等收入国家医疗卫生支出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

²⁹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³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监测：解决不平等问题”(华盛顿特区，2017 年 10 月)。

³¹ 亚太经社会，“COVID-19 疫情的影响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回应”，2020 年 3 月 26 日。

³² 教科文组织，“教育权的定价：到 2030 年实现新目标的成本”，第 18 号政策文件，2015 年 7 月。

³³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³⁴ 世卫组织，《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之路上的初级卫生保健：2019 年全球监测报告》(日内瓦，2019 年)。

但在低收入国家所占的比例正在增加。这与低收入国家减少国内政府收入中分配给医疗卫生的份额有关。这些国家，2005 至 2016 年公共卫生支出在一般公共支出所占份额的中位数(作为卫生优先顺序的指标)从 7%降至 5%。³⁵ 2000 年至 2015 年，灾难性医疗支出(其定义是相对于家庭消费或收入的大笔自付支出)的发生率持续上升。³⁶ 虽然财政保护总体上正在恶化，但有证据表明，公共卫生投资水平较高的国家往往表现得更好。

42. 将医疗卫生部门的目标转向全民卫生覆盖，同时集中收入和减少各自为政，将有助于减少医疗卫生系统的低效。根据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的说法，各国初级卫生保健支出在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增加至少 1%，才能弥合覆盖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商定的健康具体目标。³⁷ 财政保护和减少自付费用对于减少医疗卫生支出造成的健康不平等和贫困至关重要。

B. 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为社会发展创造财政空间

43. 为了应对 COVID-19 疫情，中低收入国家向国际金融机构寻求预算支持，也向双边发展伙伴提出类似请求。这一更大的财政支持需求是在 2019 年官方发展援助上升的背景下发生的。2019 年全球官方发展援助增长 1.4%，共计 1 528 亿美元，占国民总收入的 0.3%，但仍低于联合国提出的 0.7%的承诺目标。对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分别增加 2.6%和 1.3%。³⁸ 社会发展外部资金越来越多的来自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7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发展合作，高于 2015 年的 63%。同样，扩大国际税收合作也是打击避税和逃税的核心，例如防止跨国企业通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避税。³⁹

44. 近年来，官方发展援助中分配给社会发展的份额有所下降。尽管各个社会部门仍然是官方发展援助的最大受援方，但社会支出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百分比已从 2010 年的 40%下降到 2017 年的 35%，其中教育在支出份额中的降幅最大(从 2010 年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8.8%下降到 2017 年的 7.1%)。用于教育的官方发展援助在 21 世纪初翻了一番后，自 2009 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按 2016 年不变美元计算，每年约为 110 亿至 130 亿美元。最不发达国家分配给教育的官方发展援助份额从 2004 年的 47%峰值下降到 2016 年的 34%。⁴⁰ 总体而言，向社会保障系统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水平较低(2007 年至 2017 年期间平均为每年 11 亿美元)，特别是相较于分配给卫生和教育等社会服务的官方发展援助(同期平均

³⁵ Ke Xu and others, *Public Spending on Health: A Closer Look at Global Trends* (2018 年，日内瓦)。

³⁶ 世卫组织，《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之路上的初级卫生保健》。

³⁷ 同上。

³⁸ 联合国，“全球官方发展援助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在 2019 年恢复”，“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的数据更新，紧随经合组织发布的“发援会会员国在 2019 年增加援助，向最贫困国家提供更多援助”，2020 年 4 月 16 日。

³⁹ 见经合组织/20 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以及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包容性框架。

⁴⁰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每年分别为 56 亿美元和 92 亿美元)。⁴¹ 分配给社会部门的援助份额不断减少,反映了捐助国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难民的支出以及用于生产性投资(例如能源和运输)的援助有所增加。⁴²

45. 虽然外部援助在全球卫生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迫切需要紧急医疗卫生筹资来抗击 COVID-19 蔓延。据世卫组织估计,到 2020 年 12 月,需要 17 亿美元应对 COVID-19 疫情。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世卫组织已收到 8.482 亿美元捐款。⁴³

46. 包括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及其他多边和政府间机构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在 2018 年增长 4.7%,达到 719 亿美元。⁴⁴ 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进一步扩大这些银行对《2030 年议程》的贡献,包括通过采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激励措施和提交综合报告。各多边开发银行正在加大财政支持的快速发放力度,以应对 COVID-19 疫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加强社会保障系统。目前,国际筹资对于及时满足迫切需要的临时筹资需求至关重要,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

47. 经济下滑使各国严重受制于偿债义务,这阻碍了 COVID-19 疫情的应对措施。因此,20 国集团(G20)国家承诺,在 2020 年前允许有资格向国际开发协会借款的国家(外加安哥拉)暂停偿还双边债务。新创造的财政空间将让受益国能够为应对危机增加社会、卫生和经济支出。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限制,特别是商业和多边债权人被排除,以及对符合条件的国家的范围作出限制,这就把其他要求减免的低收入和重债中等收入国家排除在外。根据秘书长题为“债务与 COVID-19: 全球团结一致采取应对措施”的政策简报,⁴⁵ 将需要采取三管齐下的办法:(a) 所有提出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暂停偿还所有债务(双边、多边和商业债务);(b) 为重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债务减免,以防止违约并为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空间;(c) 制定更加公平有效的机制来解决债务危机和促进更负责任的借贷,以此改善国际金融架构。⁴⁶

C. 采取创新措施,精简现有政策和方案,包括公私伙伴关系

48.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确认,混合融资和公私伙伴关系如果得到适当和有效执行,可在可持续发展筹资方面发挥作用。该文件确认了这些做法的潜力和挑战;表示注意到“涉及公私伙伴关系等混合融资的项目应当公平分担风险和分

⁴¹ 《发展筹资:进展和前景》。

⁴²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⁴³ 世卫组织“冠状病毒病(COVID-19)捐助者和合作伙伴”。参见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donors-and-partners/funding> (2020 年 7 月 20 日查阅)。

⁴⁴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⁴⁵ 联合国,“债务与冠状病毒病:全球团结抗击疫情”,2020 年 4 月 17 日。

⁴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COVID-19 疫情与主权债务”,第 72 号政策简报,2020 年 5 月。

享回报，纳入明确的问责机制，并符合社会和环境标准”；确定了应该指导公私伙伴关系和混合融资的几项原则。⁴⁷

49. 混合金融近年来增长迅速，有助于在商业金融形成势头，以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2012 至 2018 年，通过官方发展筹资干预措施从私营部门调集了 2 051 亿美元。然而，混合金融用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情况仍然有限。2018 年，调集的民间金融中只有 5.6% 流向社会部门。⁴⁸

50. 一种用于提供服务的较新公私金融工具是社会或发展影响债券，一个政府或捐助机构通过这种债券对私人伙伴实现的具体成果作出补偿。⁴⁹ 虽然影响债券的市场仍然很小，迄今已投资约 3.7 亿美元，但它正在稳步扩大。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2019 年，28 个国家在就业、社会福利、卫生、教育和刑事司法领域发行了 135 种影响债券。⁵⁰

51. 在医疗保健部门，许多低收入国家采用一种创新的筹资方式，即债务回购和转换。⁵¹ 在回购中，第三方捐助方为一个国家偿还一部分公共贷款，以腾出资源开办国内医疗卫生项目。这一部分款项也可以与业绩挂钩，因此捐助方将其付款与特定指标挂钩。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 Debt2Health 计划就是一个例子。

52. 围绕制定新的机制为教育筹集更多财政资源的想法也形成势头，例如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教育不能等”基金和最近提出的国际促进教育融资机制。该融资机制将邀请捐助方提供担保或其他形式的或有承诺，以鼓励多边开发银行扩大教育贷款，并提供与贷款混合的赠款，以降低教育融资成本。⁵²

53. 鉴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资本有 82% 来自私营部门，确保这些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⁵³ 2000 年代医疗卫生部门的一项创新是预先市场承诺，其目的是激励制药公司为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开发治疗药物，而这些国家的民众可能负担不起这些药物。2020 年 6 月，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启动了

⁴⁷ 《发展筹资：进展和前景》。

⁴⁸ 经合组织，“从私营部门调集发展资金”。可查阅：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mobilisation.htm。

⁴⁹ 全球发展中心，发展影响债券工作组，“投资于社会成果：发展影响债券”，2013 年 10 月。

⁵⁰ 布鲁金斯学会，“影响债券纵览”，2019 年 2 月 1 日。

⁵¹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and others, *Global Health and the Futur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May 2017); Policy Cures, “Policy brief 6: debt buy-downs or conversions”, 2017 年，可查阅 <http://polycures.org/downloads/Policy%20Brief%20-%20Debt%20Conversion.pdf>。

⁵² 教育委员会，“国际教育融资机制：概要”，2018 年。

⁵³ 世界经济论坛，“让混合金融发挥作用的 5 种方法”，2017 年 1 月 10 日。

COVID-19 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旨在激励制造商生产足够数量的有效疫苗，并确保发展中国家可以公平获得疫苗。⁵⁴

五.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需处理的问题

54. 社会发展委员会是负责落实和审查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情况的主要政府间机构。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以下问题的决议草案：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E/CN.5/2020/2)、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以解决无家可归问题(E/CN.5/2020/3)以及 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第四次审查和评估的方式(E/CN.5/2020/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随后通过了所有决议草案。

55. 本节涉及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关于促成关于无家可归问题的第一项政府间决议的优先主题的工作，以及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二十五周年：应对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正在出现的社会挑战”主题的部长级论坛的工作。

A. 优先主题

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以解决无家可归问题

56. 无家可归不仅仅是缺乏实体住房，而且往往与贫困、缺乏生产性就业和基础设施以及可能构成丧失家庭、社区和归属感的其他社会问题相关。视国情而定，无家可归可被描述为个人或家庭缺乏可居住空间的状况，这可能损害他们的能力、包括享有社会关系的能力；无家可归包括居住在街头、其他空间或非供人居住的建筑物的人，以及居住在临时住所或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人，而且根据国家立法，除其他外可能包括居住在住房极为简陋、没有住房权保障和无法获得基本服务的人。⁵⁵

57. 无家可归问题波及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年龄和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无家可归主要由结构性原因造成，包括不平等、贫困、丧失住房和生计、缺乏体面工作机会、无法获得可负担住房(包括由于住房商品化的负面影响)、缺乏社会保障、无法获得土地、信贷或融资、能源或保健费用高昂以及缺乏金融和法律知识。无家可归也可能与一些促成因素和社会问题有关，包括吸毒和酗酒、精神疾患和其他精神卫生状况，或者与个人和家庭情况有关，如家庭破裂、离婚、分居和遗弃、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⁵⁶

58. 目前很难准确统计正在经受无家可归的人数，因为没有公认的无家可归定义或无家可归人数的计量方法，而且各国之间的数据往往没有可比性。联合国上一次统计全球总人数是在 2005 年，当时估计有 1 亿人无家可归。根据联合国人类

⁵⁴ Gavi Alliance, “Gavi launches innovative financing mechanism for access to COVID-19 vaccines”, 2020 年 6 月 4 日。

⁵⁵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0/7 号决议。

⁵⁶ 同上。

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的数据,全球有 16 亿人的住房条件不佳,每年约有 1 500 万人被强行驱逐。⁵⁷

59. 无家可归人口的特征越来越多样化,但过去某些群体所占比例过高,如单身成年男子、土著社区成员和脱离机构照护的人,以及老年人、年轻人、有孩子的家庭和移民,特别是无人陪伴的流徙青少年。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无家可归者的住房非常简陋,大都居住在不合乎人道条件的贫民窟和临时住区,例如过度拥挤和不安全的住房,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并面临被驱逐的风险。然而,他们不一定是社会上最贫困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各个社会群体)都有工作,但属于非正规部门的低技能和低收入工作,没有社会保障。

60. 妇女和儿童占无家可归人口的很大比例。一般认为,女性户主家庭、特别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单身母亲面临很高的无家可归风险,因为她们因为担心遭到人身侵害、绑架或贩卖,经常东躲西藏或与朋友和家人住在一起。年轻人(15 至 24 岁的人)已被认为是无家可归风险最高的人群,主要原因是家庭贫困。特别令人关切的是,通常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经常代代相传的儿童无家可归现象(通常被描述为发展中国家“街头儿童”的增加)有所增加。被遗弃儿童、患艾滋病孤儿、父母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年轻人、以及因暴力冲突或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儿童往往流落街头和居住在其他露天场所。

61. 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继续面临恶劣和没有保障的住房条件,其中许多人仍然极易无家可归,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老年人在获得适足住房方面可能面临挑战,或遭受财务欺诈、被迫驱逐或土地掠夺,因此面临无家可归的风险。老年妇女尤其具有脆弱性并面临多种形式的歧视,包括在财产和土地继承权方面。残疾人在无家可归人口中的比例特别大。残疾儿童和妇女面临更高的暴力、虐待或遗弃风险。

62. 由于冲突或气候引发的灾害(如飓风、洪水和干旱),人们可能会暂时或长期无家可归。紧急收容所和临时住房对于因灾害或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至关重要,应尽快为他们提供搬迁援助,以过渡到永久住房,缩短无家可归的时间。

63. 及时可靠的数据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从而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并首先帮助落在最后面的人。在这方面,有必要确定无家可归的类别,统一无家可归的计量标准,收集关于无家可归者的可靠和分类数据,例如按年龄、性别和残疾分列的数据,以便制定和实施适合具体情况的全面战略,并评估这些解决方案对于初步实现预期结果和取得进展是否有效。

64. 无家可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制定全面和跨部门的国家战略,范围涵盖财政、经济、劳工、住房、卫生、社会保障、城市发展、环境和人口政策,以消除造成无家可归的多重根本原因。虽然各国政府负有主要责任,但它们无法凭一己之力结束无家可归现象。因此,需要采取全社会参与的办法,推行包容和及时

⁵⁷ 人居署,“包容性城市发展政策”,在可负担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专家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2019 年 6 月,内罗毕。

满足个人、特别是那些处境不利或脆弱者的需求和愿望的政策，并考虑到与无家可归有关的现有框架和文书。

65. 可负担住房和社会保障政策具有重大作用。为了改善获得可负担住房的机会，需要加强政策，包括采取综合住房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防止非法强行驱逐，提供适当的紧急和临时住所和服务，并支持开发可负担住房，特别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持。此外，应与私营部门和当地社区合作，推动采取刺激措施，以提供各种安全、可负担、不同收入群体成员有能力获得的适当住房选择。

66. 为了减少和预防所有人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陷入贫困和脆弱性，可制定一整套政策和方案，以此提供社会保障，这可有助于防止无家可归，促进获得适足住房。例如，社会援助、住房福利、失业保护、长期护理和养老金可以解决特定的风险因素。适合国情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通过顾及年龄、残疾和性别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向最脆弱者提供协助。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可以通过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和保障基本收入，帮助防止无家可归。要继续加强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和制度，把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的覆盖面扩大到所有人。此外，运动和身体活动可以让面临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和学生获得重要的社交惠益和机会。

B. 正在出现的问题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二十五周年：应对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正在出现的社会挑战

67. 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二十五周年：应对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正在出现的社会挑战”的部长级论坛，以此纪念首脑会议二十五周年。论坛期间，会员国重申，在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愿景、原则和承诺依然有效，甚至对于应对新出现的全球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68. 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国家和指标之间以及国家和指标内的发展参差不齐。⁵⁸ 2015 年，有 7 亿多人(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10%)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许多地区的减贫步伐已经放缓。⁵⁹ 2017 年，极端工作贫困仍然普遍存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有 3 亿多工人的人均家庭收入或消费低于每天 1.90 美元。此外，全球饥饿人数在 2020 年连续第三年上升，全球仍有 8.2 亿多人在挨饿。⁶⁰

69. 收入不平等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有所加剧，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居高不下，但在一些国家明显减少。⁶¹ 此外，依然存在由于性别、种族、族裔、城市或农村居住地、残疾和移民身份原因而不能平等获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现象。人口动态也在发生变化，许多国家目前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到 2050 年，约 16%的世界人口

⁵⁸ 见 E/CN.5/2020/5。

⁵⁹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9.I.6)。

⁶⁰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机构，《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防止经济放缓和下滑》(2019 年，罗马)。

⁶¹ 《2020 年世界社会报告：剧变世界中的不平等》(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20.IV.1)。

将超过 65 岁，而 2019 年这一比例为 9%。这一趋势将对养老金制度、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医疗保健和长期护理产生影响。

70. 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技术进步正在影响着世界各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由于新技术和工作组织方面的不断变化已成为现代工作场所的常态，这波及到许多行业的工人，因此，工人需要提升或更新技能，才能跟上对更高水平技能的需求。有必要确保他们在劳动力市场过渡期间获得终身学习方面的支持。因为许多工作是合同制并缺乏传统工作的好处和稳定性，新技术也在加剧劳动力两极分化和非标准工作安排。

71. 需要维护迄今在执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和《2030 年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确保在不让任何人在从当前危机恢复的过程中掉队或进一步落后。有效的社会政策对于实现更好的恢复并走上更具包容、更可持续的道路至关重要。因此，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对于根据 25 年来执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经验教训，全面整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层面和执行《2030 年议程》至关重要。投资于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创造体面就业和增强民众权能，是预防和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以及提高所有人的福祉和复原力的最佳途径。

六. 结论和建议

72. 尽管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进展步伐缓慢，差距依然存在。目前的 COVID-19 危机可能会逆转几十年来的社会发展进步，使更多人掉队。这场危机还对各国政府实现《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的关键时刻，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愿景、原则和承诺仍然有效，对于应对新出现的全球挑战至关重要。过去 25 年吸取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各国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包容各方的可持续发展，为此采取全政府和全社会参与办法，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处境最不利的群体参与进来。

73. 作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为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大会不妨审议以下建议：

(a) 面对 COVID-19 危机，各会员国应把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放在危机应对和恢复工作的中心位置，以期“重建得更好”；

(b) 为了能够实现包容、更公平和有适应力的恢复，会员国应创造必要的财政空间，维护迄今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具体方式是采取改进国内资源调动以及开展国际和区域金融和技术合作这一综合措施，并借重于私营部门资源，以此调动充足和可持续的资金；

(c) 会员国应继续投资于适合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包容、优质的教育和卫生服务，以确保可持续恢复，加强对未来冲击的防范；

(d) 为支持更好的恢复，会员国应根据数据、分析和证据制定政策，以应对危机对处境不利和弱势群体的不同影响，重点是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确保平等获得医疗保健、优质教育和信息和通信技术，建立包容性机构，在增长型部门创造

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同时保护和增强风险群体，特别是从事非正规和脆弱工作的群体以及中小微企业的复原力；

(e) 国际社会应促进全球团结，协助需要国际支持的国家重建得更好，特别是投资于国家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缩小数字鸿沟，维持全球粮食供应链。
